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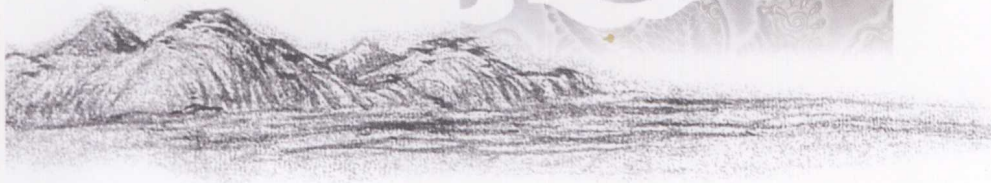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X

新编中国文化史

xinbian zhongguo wenhuashi

许 结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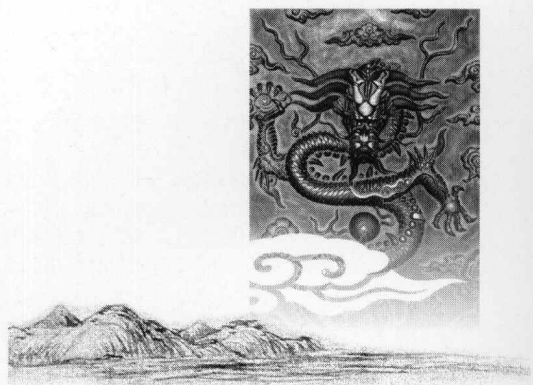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编中国文化史

许 结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中国文化史/许结编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43-8212-3

I. 新… II. 许…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561 号

书 名 新编中国文化史
作 者 许 结
责任编辑 周 方
装帧设计 刘小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马鞍山分厂
厂 址 马鞍山市花山工业集中区(邮编 243000)
电 话 0555-8283603 8283625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400 000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8212-3/G·7849
定 价 29.00 元
批发电话 025-83260760,83260768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8008289797
短信咨询 106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引 论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汉族与 55 个少数民族共同建构的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展示，具有极大的传承性与包容性。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为当今社会开创新文化提供了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

“文化”是什么？“文化史”的研究范畴是什么？中外学者论述甚多，仁智各见，难有统一的定论。

对“文化”的界定，我们一般引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作为“文”与“化”的合成词，与“武功”相对。这显然不能涵盖文化的全义，所以我们又追溯到先秦典籍中有关“文”与“文明”的说法。如《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易·贲·彖》“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广义的“文”或“文明”生发，“文化”的功能也就被引申出来。比如由“文”生发，其一，《尚书序》谓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是由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其二，《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尚书·舜典》“浚哲文明”孔颖达疏“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引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是由伦理（纹理）推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的意思，与“质”、“实”对称。其三，《礼记·乐记》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是由此生出美善德行之义。而文化的功能，如记录功能，认知功能，传播功能，教化功能，凝聚功能，调控功能等等，也由此推导而出。

“文化”有着无限的扩展空间，而“文化史”的研究则在有限的空间中确定其内涵，于是又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最广义的文化史是包罗万象的中华文

明的历史；最狭义的文化史则是文化精神的发展史，而目前文化学家的取则，多半采取一种“中观”态度，有的把文化史划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四层次；有的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层次，有的则依照学科划分，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科学等。在多年课堂教学实践中，我认为这种态度与取则比较合理而切实可行。所以我选择九个部分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状况与发展走向，分别是：文化基础、制度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文化、民俗文化、文学艺术、文化交流与文化转型。在这九个部分的组合中，始终奉行一个原则，就是在文化历史的讲述中，强化文化知识系统的介绍，达到文化精神的提升。

二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均在其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与社会组织形态这三维空间形成与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的完型，与其大河大陆型地理环境相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重土厚生和因地制宜的文化观念。受地理环境和季节性气候的影响，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发育成熟极早，所谓“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从而形成世代相传的安居乐业的耕织文明。其中授时颁政、劝课农桑、定立田制成为历代政府的要务，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才”之道根植于以农为本的文化思想之中。因农耕生活聚族而居，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家族制与宗法制相生相济的社会形态。而在文化的三维构成中，我们还应关注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层面，即王国宫廷文化、士大夫精英文化与普世的民俗文化。如果在其间提炼出共有的文化精神，就是以孝养与孝敬为核心的伦理政治与道德精神，并由此构成伦理型文化模式。其由家族而推扩于人类社会、自然宇宙，以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了解这一切，又在于对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文化经典的解读，只有通过文化经典，才能认识文化历程。

在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完备的文化制度，其中最突出的是宗法制度、职官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礼乐制度、婚姻制度与兵役制度。

宗法制作作为政体结构，源起于古老的氏族制，完成于西周时代的世袭制、分封制与宗庙祭祀制。东周以降，旧宗法制破坏，自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在君主制下对旧宗法制进行了改造，改封邦建国所体现的宗族优势成帝国专制下的家族优势。在漫长的家族优势阶段，又有两大时期值得注意：一是东汉迄魏晋

在强宗大族的势力下形成的门阀制度；二是宋代形成的家族共治形式的“宗族共同体”。官制是关于国家管理机构的建置、职掌与官吏的设置、考选的制度，中国文化既以“人”为本，又长于“治人”，所以职官制度极为严密，不仅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系统而宏整的权力网络，而且体现了尊天法地、应化四时的农耕经济文化特色。古代教育，大体有官学、私学与书院教学三类。其中官学在古代教学制度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私学只是官学的变化与补充，但古代教育家与教育思想，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学的兴起。而书院教育则是介乎官、私之间（有官办与私立）的一种教育形式，兴起于宋初，终结于晚清，其教训合一的教学思想、独特的教学形式与自由讲学的精神，是值得注意的。选举制度实质就是选官制度，概括地讲，最具代表性的是汉代形成的“察举制”与到唐代完成的“科举制”。尽管古代选举制度弊端丛生，但察举制之“选贤与能”的意图和科举制之相对“平等竞争”的方法，却是值得肯定的。在诸多制度中，礼乐制度的建立应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汉书·礼乐志》即谓“《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在《礼记·乐记》中，礼与乐被提升到自然准则的高度：“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所以历代王朝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以达到《孝经》所引孔子说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政教目的。而在礼教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婚姻制度又是文明进步的一大风向标，所以对古代从群婚制到专偶婚制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古人经常文、武对举，所以往往把“武功”撇在“文化”之外，这是不妥的，考察古代“五礼”，军礼位居其要，其实古代兵役制度与军事思想，本来就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制度文化相比，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与科学发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中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农学、医学，均有着突出的成就。而服饰与饮食、居宅与交通，也体现古人的发明智慧。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成为科技发明的标志性成果，受到世界科学史家的一致推崇。如果从文化制度来看古代科技，则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根植于农耕经济的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这一则反映于科技工作皆由官府所掌，一则表现于与政治人生相关的学科和技术最为发达，而且被推尊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周礼·考工记》）的高度，成就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圣学传统。

作为文化的重要内涵，宗教具有仪式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性。中国古代宗教初源于鬼神观念，因缺少“一元神”的统率而显出“泛神论”色彩，到秦

汉时代，逐渐形成的祭五帝四方之神、郊祀天地之礼及武帝时的尊神“太一”的崇拜，神学趋向于国教化。道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具备宗教思想、仪式、神谱、组织以及有专业神职人员传教的“制度化宗教”。道教萌发于周秦之际，完形于东汉年间，繁盛于两晋，变革于唐宋金元，颓衰于明清之世。道教教义以“道”为核心，尊奉“三清”诸神，求“得道成仙”，所以接受巫觋之术，创建了一套养生祛灾法术（主要有丹鼎派与符篆派）。由于道教是产生于本土的宗教，其与民间信仰最为接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亦大，其中较显著的是科学（化学与医学）、文学（传奇）与民俗学对道教的接受。佛教作为外来宗教，经历了由异域文化向中国化发展的进程。佛教原始教义有“四谛说”与“创世说”等，其传入中土而蔚为大观，首先在翻译经典。从东汉经魏晋到隋唐，佛经的传译有两个特点，即大、小乘佛教的传入，而大乘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部派佛教（上座部、大众部）的传入，经中国僧侣的选择，渐为宗派佛教所取代，而逐渐走向完全中国化的道路，并经发展与传扬，使之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唐代已传入中国，前者在元朝有较大影响，后者到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始大兴，经康熙以后“百年禁教”，迨至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新教再度传入中国，其影响已属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学术文化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从时代的发展来看，自殷商巫史文化到西周史官文化，初启中国古代学术之门；而由西周史官文化到战国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乾嘉考据之学，又历史地勾画出“一代有一代学术之胜”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时代奠定的史官文化，其所表现的天人合一而以人为本的精神、政治与学术交织且以政治统率学术的特征，以及史官职守的包容性与史学的兼融性，无疑影响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而战国诸子学争鸣，则为中国学术开辟了辉煌的境地，其中儒、道、法、墨被视为显学，而儒、道学术尤为中国古代人文思想体系建立的两条主线。加上东汉以后佛教的东传与佛学思想的建立，又形成具有学理意义的“三教论衡”的局面。所以在古代纷繁复杂的学术思想中提摄其精神，人们又尝合称儒家的德教为宗、道家的玄化为本与佛家的空观妙旨为“三教”理论，视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干。

在讨论传统文化的内涵及价值时，往往牵涉到“大文化传统”与“小文化传统”问题，因为文化史是由流传于今的文化经典构成，所以常限于“大文化传统”的精英文化层，而相对忽略作为“小文化传统”的民间文化层。其实，如果不要太多地考虑二者间的对立，通过对文化经典中保留的大量民俗文化内

容的整理与探讨,则可以看到文化史自身的多元性。而岁时风俗,民俗信仰,以及民间的游乐与竞技、传说与民谣等方面,均能彰显民俗文化的特征以及在整个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

艺术与道德、科学被称为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中国古代艺术以极为形象生动的创造,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古代艺术类型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诗歌、散文等,或以其抽象的艺术形式,或以其精心的艺术构思,表现出静穆庄严与灵巧飞动统一的艺术境界。而以诗歌与散文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又以其生动活泼的创造与想象,展现出中国文人的心路历程和人格情操,这又与中国文化精神是契合相通的。

三

一部文化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的历史,没有文化的交流,就没有文化的发展。近代学者的“放眼看世界”,固然向人们昭示了一种新的文化史观,而从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回顾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同样昭示了不断交流、不断进取的文化传统,从华夏文化的形成,到丝绸之路的开拓;从汉唐盛世的局面,看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这样的文化认同,是明晰而雄辩的。

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传统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开启了文化的现代进程。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认为,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论其主要征象,则在中与西文化的冲突和新与旧文化的交变。这些冲突与变革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系列重大历史文化事件而不断深化,文化变革也从物质层面推进至制度层面与观念层面。在诸多变革中,教育制度的变革、学术观念的变革、宗教思想的变革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确立,最能表现这一时期文化的转折。由中西文明冲突派生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与“汇通中西”的文化论争,成为近百年重要话语。

在传统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中,文化的视野应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拓展,这又充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现代台、港、澳文化,既有传统的因子,又有时代的征象,这是我们应该纳入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的;特别是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有着千丝万缕之关联的历史,就是对少数人鼓吹“文化台独”最有力的批驳。二是海外华侨与华人文化,并由此构成的世界性的文化网络,这也是当

今中国文化与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

从近代文化变革看当代新文化建设，仍可提供很多借鉴，其中如中国本位文化的自我保持与更新问题，中外文化的比较与融通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并付诸实践的。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中国文化基础	1
第一节 文化的地理环境	1
第二节 文化的经济基础	10
第三节 伦理文化精神	15
第四节 传统经典解读	24
第二章 古代的制度文化	30
第一节 宗法制度	30
第二节 职官制度	37
第三节 教育制度	47
第四节 选举制度	54
第五节 礼乐制度	62
第六节 婚姻制度	72
第七节 兵役制度	78
第三章 古代的科技文化	85
第一节 天文与历数	85
第二节 农学与医学	91
第三节 机械与发明	96
第四节 衣食住行与科技	100
第五节 传统科技思想	111
第四章 古代的宗教文化	116
第一节 崇拜、巫术与神话	116
第二节 道教的形成与流变	124

第三节	佛教的中国化	133
第四节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144
第五章	古代的学术文化	153
第一节	殷周巫史	153
第二节	战国诸子	158
第三节	汉代经学	174
第四节	魏晋玄学	178
第五节	隋唐佛学	185
第六节	宋明理学	189
第七节	清代朴学	197
第六章	古代的民俗文化	204
第一节	岁时风俗	204
第二节	民俗信仰	213
第三节	游戏技艺	219
第七章	古代的文学艺术	226
第一节	文学的发展历程	226
第二节	艺术的主要类型	233
第三节	文艺中的文化蕴涵	248
第八章	古代的文化交流	256
第一节	华夏文化的形成	256
第二节	统一文化的交流	260
第三节	西学东渐的历史	268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279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近代化	279
第二节	台、港、澳文化鸟瞰	285
第三节	华侨与海外华人文化	290
第四节	当代文化的发展走向	298
后 记		302

第一章 中国文化基础

本章提要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以血缘为基础,以家庭为细胞,以天人和諧为宗旨的伦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内在核心是人性论,并突出表现于以“孝”为中心的仁爱恭敬思想,由此外向扩展,则是天人合一的伦理政治。而这种伦理文化模式的形成,又与中国古代地理文化环境与经济文化类型及政治文化形态切切相关,从而构成以孝亲为本源,以道德为功用,以家国一体为理念的和谐文化形态。而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认知与解读,则是探讨中国文化基础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地理环境、文明起源、区域文化、政区、农耕经济、授时颁政、田制、三才、月令、伦理、礼仪之邦、孝敬、和谐、文化经典、图书制度

第一节 文化的地理环境

中国古代天与人的关系构成文化的终极伦理,地与人的关系则属于环境伦理。中国文化政治,因地制宜,因俗治人,首先源于崇天而重地的思想。从中国古代由大河大陆型的地理观念到近代大陆海洋型地理观念的变迁,从古老的氏族板块文化到流行于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地理与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亘古常新的课题。

一、地理环境与文化观念

中国古代的自然地理环境有鲜明的特点,其西北是帕米尔高原,崎岖的山路和严寒、干旱,构成古代难以逾越的天险;西南的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的江河,

又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障碍；北方寥廓无际的草原与沙漠，阻隔了各民族间的交往；加上黑龙江东部至东南沿海的2万多公里的海岸，四周都是天然的屏障，形成了中国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这一地理单元由西向东形成三大阶梯。第一阶梯是西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第二阶梯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四川盆地等，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内。第三阶梯是平均海拔低于500米的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一线及云贵以东地区。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构成中国特有的季节性气候和东密西疏的人口结构。受这种地理条件的制约，与欧洲农牧结合的特点相对，中国古代农业区与游牧区分野清楚但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

从宏观的地理环境特征看中国文明的起源，至今还没有准确的结论。但在一些古代神话与古史的记述中，却能看到在先民地理文化观念中存在的重土意识与山岳崇拜，则能给我们某些启示。如战国秦汉年间流行的“三皇”传说，指天皇、地皇、人皇。传说天皇氏起于昆仑，是西方的种族；地皇氏兴于熊耳、龙门，是中部的酋长；人皇氏出于暘谷、九河，是东方的部落。这个传说透露了中国文化起源于西部昆仑而向中部、东部迁移发展的信息，同时也说明了古代原始氏族部落占山划地以求生存的性质。而具有制礼作裳、创造文字、图画八卦的人类文明始祖伏羲氏，他的原型就是昆仑山诸神中的一位尊神，这也是古人追溯中国文化发源地的一种说法。

文献记载中的昆仑山并非现实地理意义上的山脉，它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山，是中国人古老观念中的“文化昆仑”。据早期典籍记述，昆仑面临西海，山中桂树丛生，地上铺着很多金玉。山分三级，最下是樊桐，又叫板桐；中间是玄圃，一名闾风；最上是层城，又叫天庭，是太帝所居之处。屈原在《离骚》中列举的“若木”、“白水”之名，以及诗中反复推述的行程：“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等，无不旨归于“昆仑”。对昆仑的崇拜，还与传说中的昆仑山以产玉闻名有关。古人以为服玉可以长生不老，屈原在《九章·涉江》中写道“登昆仑兮食玉英”，即在幻想世界中登上昆仑山服食玉英（玉的精华），以至长生不死，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多供奉昆仑诸神，又称它为“玉昆”，即群玉山。李白的《清平调》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歌咏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将她比作昆仑山上的女神；李贺《马诗》的“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昆”，追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也联想到此山，这些都是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和悠久的神话传说为基础的。

而与实际地理环境相结合,古人又有了“河出昆仑”的说法。古人看到奔腾不息的黄河,惊异于它的水量之大,以为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能力可为,于是赋予它源出神山的传说。《淮南子·览冥训》有这样的记载:“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历代学者所作的《河源考》,又与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传统观念相关。撇开具有创世纪神话性质的古史传说不提,从人类文化起源来看,人类文化最先开始于有河水灌溉的地区,肥沃的冲积带和充足的水分为农业的生产提供了天然便利的条件。我国古代文化遗址分布极广,如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岷江附近的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和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等,已显示早期农耕文明的征象。但文化的起源并不依赖河流本身,而是河流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的两岸和它流进大河的两水相交的那一个三角地带,是古代中国文化的摇篮。例如,唐、虞文化兴于山西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夏文化兴于河南西部黄河大曲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周文化兴于山西东部、黄河大曲的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此后相继繁荣的江汉、江淮以及珠江三角洲等,表明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发展与扩大。从这样的地理环境与地缘特征,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地域文化、两河文化(南北文化)与大一统文化的递进关系和结构关系。

我国古代学者早已深明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比如《管子》的作者分析当时各地区各邦国的不同,认为齐国的水流迫急,那里的人就贪婪、粗暴而且好勇;楚国的水柔弱而清静,人们就轻捷、果断而敢作敢为;越国的水浊重而侵蚀土壤,人就愚笨好妒忌;秦国的水浓聚而迟滞,淤浊而混杂,人就贪婪、残暴;晋国的水苦涩而浑浊,人就谄谀而包藏祸心,巧佞而好财利;燕国的水深聚而柔弱,人就愚憨而好讲坚贞,轻急而不怕死;宋国的水轻强而清明,人就淳朴平易而喜欢公正。这种观点接近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当然,过分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忽略物质生产的中介,自然引起西方一些学者的不满,从而出现了以心智说驳正地理决定论的文化思潮。而在我国古代,已经有学者认识到虽然人非水土不生,但并非完全受水土的限制。人性虽源于天赋,但从京城首善之区以至沿海边缘地带,凡是阳光能照到的地方,都会因君主的政令和师长的教化而改变习性。政令教化和水土的作用都不可忽视。的确,如果地理能支配历史,那么五百年前的美洲,地形气候和今天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为何它的文化却判若天渊呢?

其实,中国古代,由于三才理念的成熟,对人、地关系也如天人相与一样,学者多持圆通的论断,这可以从《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山海经》到顾炎

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众多的地理论著中,看到古代学者对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所持的见解。古代地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周礼》设置了大司徒、职方氏、冢人等二十余种官职掌握九州形势,山川所宜,涉及到土地、财政、民族、人口、城市、村落、墓园等各端,构成极为完备的人文地理知识体系。古代的地理学研究将地域观念与行政管理结合起来,他们虽讲“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礼记·王制》),但其地域观念的着眼点与国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因地论人不同,而是以地域的差别为王者制礼与治理提供学术指导,这就是所谓的移风易俗,以教化培养理想的人伦。唐太宗曾将天下分为十道来治理,他的四子李泰为此写出了《括地志》。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的目的也在于帮助明王圣主了解天下的形势,占据有利的地势,以获得战争的胜利。正因如此,致用精神成了地理学的中轴。

虽然多数文化史家认为由于负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和重内陆的地理意识,使中国文化显出一定的保守性,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古人论地是与天、人对待而言,这中间又内含了极大的拓展性和广博性,地理研究中的世界观和开放性意识早已露出端倪。这从“九州”说中能发现一些端倪。“九州”之名,起于战国中期。当时列国纷争,战火连天,人们渴望统一,于是产生了区划中原的思想萌芽,因而《禹贡》便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这已经涵盖了两河地区。而战国时期的燕国人邹衍提倡的“大九州”的观点,可以认定为是最早的世界观雏形。邹衍得到海外交通的启发,认为《禹贡》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同样大小的州共有九个,但不过是被海环绕的小九州;这样的小九州共有九个,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为大瀛洲所环绕。虽然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假说,但他开阔的视野和无垠的空间意识无疑极有启发意义。由于中国古代人具有广袤的大地观念,所以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族人称其他四境民族的夷、狄、戎、蛮为四海,而天子君临天下,所谓的“天下”就是外及四海,这也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一致。

二、地理文化的历史特征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国,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同时,中国的历史又是从早期区域政治走向统一政治的历史,所以其地理文化的历史特征又是统一的文化观念。而在区域文化与统一文化之间,南北文化则缘于两河文明,成为中国古代地理文化观念的重要范畴。

我国古代的区域文化产生于地缘群体的形成,并经长期的组合,逐渐成熟。

在先秦时期,就有了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西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庄子·逍遥游》中有寓言说:一个宋国人到越国去做帽子生意,可是来到越国一看,那里的人剪光头发,身上刺满花纹,根本就不需要帽子作为装饰品。宋国人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而致使生意失败,同时也说明了吴越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巨大差异。在中原,男子二十岁就戴上标志成年的“冠”,而越国人却没有这样的礼俗。吴越地处三江五湖,水给人们带来了秀丽的山川、丰富的水产、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交通,但水患灾难增加了人们对水的神秘感与恐惧感。吴越人在劳动时,为减少水的阻力,避免水草的缠绕,保护生命的安全,就剪掉长发,出现了“断发文身”的风俗习惯。再以荆楚文化为例,战国时期,南方的荆楚文化极具地方色彩,当地著名作家屈原的作品充分展示了这种文化的魅力。这里有诡异离奇的说法:《离骚》中作者远游时驾八龙、载云旗,令云师丰隆驾彩云为自己寻求神女宓妃,让鸩鸟去有娥国帮自己向美女说媒;有神奇古怪的言谈:《招魂》中说拔木的大力士有九颗脑袋,土神长了三只眼睛;有耿直不阿的胸怀:《离骚》的结尾要以谏君不从,愤而投水的殷大夫彭咸为榜样,《悲回风》表示要追随因忠谏而赐死的伍子胥,死后浮江入海来顺适自己的心愿;有“荒乱淫邪”的内容:《招魂》中写男男女女杂坐一处,不加避嫌,日日夜夜欢愉饮酒,沉醉其中以为快乐。作品虽然明示了屈原的文学个性,但实际上这是楚文化崇巫医、重神怪、好聘情等特点的文学再现,与产生经典的中原文化自然不同。

地域的不同造成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但随着高度统一国家的发展,时代越后,文化交流越频繁,地域色彩也越来越淡薄。从历史进程来看,时代愈古,部落分布越多;时代越后,兼并更为激烈,地缘群体也化零为整,所以到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完成,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因融蚀而消解。但从整个文化结构来看,地域文化又不因帝国文化的统摄而消失。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帝国疆土的拓展和变迁,新的地域不断兴盛,如汉代的西域文化、唐代的岭南文化、南宋的闽浙文化,都富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和独有的风采。另外,人系水土风俗,积淀深厚的文化心理,有不随时间的变迁而变迁的深层底蕴,如论古代学术则有洛中、江左;论诗文则有江西、桐城;论戏剧则有临川、吴江;论绘画则有吴派、浙派;论菜系,则有川菜、粤菜、淮扬菜等,都是因地而异的流派意识。

由于南北两河流域是生民所依赖的母亲河,而且古代政权多次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因此在地域文化中,中国古代习惯以南北文化对称。大体来说,北方风格刚健,南方风格柔婉。古老的神话故事透露了二者最初的差异。据《吕氏春秋·音初篇》记载,说大禹王巡视治水的路上,遇见涂山氏之女,产生了恋情,可

是不久又巡视南方去了。涂山氏之女就让婢女在涂山南边等待禹的到来,涂山氏之女唱起了“候人兮猗”(等待君子啊),后人将这首歌视为最初的南方歌曲。有娥氏有两个未嫁的闺女,国王建造了一个九层的高坛让她们居住。天帝命令燕子去探视她们,两个女孩十分喜欢燕子“啾呀”的叫声,就捉住了它,用玉筐将它盖住。一会儿打开看时,燕子往北飞走了,只留下两枚蛋。两个女孩就作了一首歌,结尾是“燕燕往飞”,传说这是最初的北音。“候人兮猗”四字中只有前两字有实在意义,“兮猗”是拉长声音的语气词,因此这四字唱起来就很柔婉。相比之下“燕燕往飞”显得刚急有力。

南北风格的差异全面表现在文学、经学、绘画、戏剧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以文学为例。先秦时期《诗经》与《楚辞》是二者的代表。《诗经》中的北方诗歌描写打猎战斗的场景,读后令人翹然自喜,忼然有跃马贾勇之气;而《楚辞》诸篇,音涉哀思,托词寓物,以芳草美人代表高尚的品行,语言郁纡而感伤,读后愀然有登山临水、羈臣弃妇之思。由于南北朝时期中国的长期分裂,南北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南方文风文雅,贵清绮,重形式,文辞华美,以诗擅场,宜于咏歌;北方文风质朴,贵刚直,重内容,气质健劲,以文见长,便于实用。概括地说,就是北文理胜其辞,南文辞过其意。不仅文人的创作表现出这样的特色,民歌也有这样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诗,如“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以织丝不成匹段隐喻情人不成匹配,显得深沉含蓄。北方民歌抒情的气势豪宕,境界开阔粗犷,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就是对待负心的男子,北朝女子也不像南方女孩那样缠绵悱恻,而是如“欲来不来早语我”这般果断。

中国画有南派和北派之说,南派飘逸、洒脱,表现文人的气质和胸怀。北派用笔繁复,造型严谨。南派注重秀美,追求韵味;北派以雄浑为主,以骨法见长。即使同样画山,南方的山玲珑峻峭,讲究笔墨情趣;北方的山绵延起伏、气势磅礴。南派风格讲究灵动、潇洒、轻妙,善山水花鸟,常抒发文人归隐的闲情,多为小幅;北派的画风则多凝重、厚实、古朴,长于人物刻画,常表现历史场景,多为巨幅。

在学术思想上,南方学术环境宽松,大多喜欢形而上学的探究,有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哲学思辨水平;而北方的学者严格遵守师传,多以经验世界为世界观的基础,礼法和仪文极其繁缛,忽视了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探讨。北方的学者对于宇宙,只考察现象变化的规则,而南方学者则进而阐明宇宙的内在规律。先秦时期的老子和孔子可以作为南北学术不同风格的代表,直到南北朝时期依旧保